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1966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刘硕良

婚礼华盖

〔以色列〕撒母尔·约瑟夫·阿格农

(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徐燕 等译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刘硕良

婚礼华盖

(以色列)撒母尔·约瑟夫·阿格农

(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徐新 等译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 03 号

·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

婚 礼 华 盖

〔以色列〕撒母尔·约瑟夫·阿格农 著

徐 新 等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18.75 插页 6 字数 437,000

1995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7,000 册

ISBN 7—5407—1671—1/I·1080

定价 (平) 18.00 元 (精) 2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新时期有数的宏伟工程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序

刘硕良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的译介，不自今日始。早在二三十年代，一些获奖作家的作品就介绍到中国来了。我们久已熟知的文学名著，如《约翰·克利斯朵夫》、《静静的顿河》、《布登勃洛克一家》等等，都是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代表作。不过，以往这些译介都没有特别着眼于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角度，甚或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它，而且所介绍的数量有限，大部分获奖作家还不为中国读者所知晓。

适应改革开放大潮推出的这套壮观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同以往的零散译介。它以系统介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为己任，凡是这个头号国际文学大奖的得主，都要尽量为之单独选出1卷，体裁不限，长短不拘；每卷均有译序和授奖词、答词、生平年表、著作目录，力求给读者提供一个能真实地反映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每一得主的风貌的较好版本。不仅过去译过的获奖作家的若干名著要适当选入本丛书，更要深入地介绍许多尚无译文、尚未在中国展露其庐山真面目的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即使过去已有译介的作品，收入本丛书后，译文作了更新或校订，并增加了前言、附录，其译介的深度和精确度也已胜越于旧译。

为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有计划有系统地出版这么一套大

型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呢？当1982年丛书头4种问世时，就有人表示过怀疑。随着社会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丛书各卷的陆续推出，随着人们视野的逐步开阔，在经历过从简单否定到一味推崇两个极端之后，对诺贝尔文学奖持客观的有分析的科学态度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套丛书的价值和作用也已为文学界、新闻出版界和越来越多的读者所确认了。但人们的认识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直到现在，仍然有人不很理解：“诺贝尔文学奖不是资产阶级的吗？不是带有地域和政治偏见的吗？为什么我们要以它为标准来划线呢？……”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丛书的出版意图，回答关心它的同志的疑问，趁丛书加快出版进度、力争两三年出齐90卷，并采用统一的封面设计，各卷逐步纳入新的外形框架的机会，增写了这篇总序，谈谈这套丛书的缘起和设想，以进一步和广大读者沟通，并就教于各地方家。

*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1979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长沙召开，首次确定了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涉足外国文学领域的出版社很快由两三家增加到几十家。1980年冬才挂牌的漓江出版社面对并起的群雄，面对人民文学、上海译文两家最具权威的老牌出版社，感到要在众山夹峙的缝隙中走出一条生路来，非另辟蹊径不可。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推出了以《保尔和薇吉妮》、《白夜》、《巴黎的忧郁》开头的小开本“外国文学名著”系列，也正是基于要自成特色、要开拓新领域、要出一批名著而又少重复以至不重复“人文”、“译文”足印的考虑，当郑克鲁和金子信两位先生1981年联合建议推出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时，我们很快就接受了。

不错，文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文学奖的颁发往往会和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相联系。诺贝尔文学奖既生发于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烙印。意识形态的不同，价值观念的不同，常常导致人们对文艺作品及其评奖工作的认识上的歧异。大家看到，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的评选，物理奖、化学奖、医学奖的得主，一般都众望所归，极少异议，而文学奖就比较麻烦，不时会引

起这样那样的诘责和批评。是不是一有非议就证明评委们评错了呢？恐怕还不能这么看。文学作品的特性本来就容易使它人言言殊，不像自然科学成果那样有比较统一的、公认的、可以量化的鉴评标准，加之诺贝尔文学奖本身虽以张扬“理想主义”相要求，实际衡量和掌握时却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外人无从得知其内幕详情——即使是评委也不得透露近50年的有关档案，所以，在批评意见和评奖理由之间有时很难径情直遂地作出谁是谁非的判断。但抛开这些因素不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工作主观上存在某种局限，有时囿于视野或偏见，以致较次要的作家获奖，更显要得多的作家却名落孙山的情况，是确实有过的。

以地域来说。诺贝尔文学奖从1901年开始颁发，到1991年止，中间有7年因战争未授奖，有4年每年授予2位作家，实际得奖作家共有88位（萨特未领奖）。他们分布在5大洲30个国家，而主要集中于欧美，其中法国12人，美国9人，英国8人，瑞典7人，德国6人，意大利5人，西班牙5人，俄苏4人，挪威、丹麦、波兰各3人，爱尔兰、瑞士、智利、希腊各2人，比利时、南斯拉夫、捷克、冰岛、芬兰、以色列、尼日利亚、埃及、南非、印度、日本、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墨西哥、澳大利亚等15国各1人。尽管评委会近几年第一次颁奖给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优秀作家，受到舆论的广泛好评，人们仍然觉得还有一些地区和国家的杰出作家理应更早更多地进入获奖行列。就拿亚洲来说，获奖作家迄今仅有2位，而北欧却有12位，悬殊如此之大，无论就各该地区的文学状况或就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来说，都未必与实际相副。造成这种悬殊显然不单纯是亚洲文学翻译介绍少所能解释得通的。

以作家来说。一方面，托尔斯泰、博尔赫斯这样一些文学大师未能获奖，总使人不免有遗珠之感（受损害的决不会是这些大师本人），特别是拿他们和某些获奖作家的实际成就与历史作用相比较，更让人难以理解评奖的天平究竟是怎样倾斜的。另一方面，某些对社会主义持反对态度的作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流亡作家得奖，除了他们文学上的业绩外，明眼人都不难看出其中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不然为什么不授给那些文学成就显然更高而思想比较进步或者比较持中的著名作家呢。

凡此种种，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缺陷和不足。其实，任何文

学奖的颁发都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和侧重角度,都受一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制约,不可能十全十美、皆大欢喜。我们无意苛求诺贝尔文学奖,要它绝对公正,完美无缺;指出诺贝尔文学奖的局限,只是要如实地对它加以评价,不盲目地把它看得至高无上,不唯“诺贝尔”马首是瞻,不患“诺贝尔情结”。对任何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及其获奖作家作品在内,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独立的评判。盲目崇拜是最没有出息的。

明乎此,我们还要出版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我想至少有三层考虑:

一、诺贝尔文学奖毕竟奖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杰出作家,他们的优异产品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和人类共同财富的一部分,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借鉴。许多举世公认的名家,如罗曼·罗兰、法朗士、莫里亚克、纪德、萨特、加缪、奥尼尔、福克纳、海明威、吉卜林、肖伯纳、叶芝、艾略特、贝凯特、托马斯·曼、黑塞、伯尔、肖洛霍夫、皮兰德娄、显克维奇、阿斯图里亚斯、聂鲁达、马尔克斯、帕斯、塞拉、拉格洛夫、汉姆生、泰戈尔、川端康成、索因卡、马哈福兹、戈迪默……荣膺了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使这项大奖当之无愧地拥有不凡的品位和隆盛的声誉。有些获奖者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不算很大,但在其所在国或所在地区仍然占居重要的位置。至于有些作家获奖时呼声甚高,过后则影响减退,这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是正常的。中外文学史上都有一些作家如彗星划过天空,不能把光亮久留人间,但这并不排斥他们的价值有朝一日又可能重新得到人们的发现和承认。文学现象纷繁多变,我们很难简单地从获奖者一时声名的盛衰来断定其当年获奖是否允当。

二、诺贝尔文学奖毕竟是本世纪以来国际上最重要、最持久、最有影响的文学现象之一,它对各国各民族众多作家的吸引力是有目共睹的。这一点,即使从它有时授奖欠公而引起种种议论也能得证明——证明它为世人为文坛所普遍关注。对于这样一项大奖,这样一种辐射面宽广、渗透力深远的国际文学现象,世界各国都颇为重视,我们中国作为文学大国,理应对它有可能如实的客观的了解,理应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对它进行科学的审视和独到的评析,如果我们不系统出版其作品,又

有什么根据对它发出这样那样的指责和议论呢!

三、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等于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这个大奖和所有获奖者及其作品。如前所述,获奖的不见得完全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未获奖的并不因此而贬损其价值。我们组编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无非是在新时期改革开放潮流的促动下,从新的角度多开一扇窗口,对北京、上海已出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和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起一点补充配合的作用,丝毫没有以诺贝尔文学奖为标准来对外国文学作品划线的意思,当然也就谈不上以它来识鉴和取舍所有外国文学作品了。即从漓江出版社来说,我们在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同时,还推出了一系列其他外国文学名著和《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域外诗丛》等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尽管如此,作为新时期我国翻译界出版界一项有数的宏伟工程,《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仍以它新颖的角度、诱人的色彩,受到了广大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欢迎和关注,得到了社会多方面的支持和鼓励。全国“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包括了这套丛书。在新闻出版署主办的首届(1980—1990)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评奖中,这套丛书有3种——福克纳卷《我弥留之际》、莫里亚克卷《爱的荒漠》、阿斯图里亚斯卷《玉米人》同获一等奖,占一等奖图书总数19种的15%。许多作家赞扬和购藏这套丛书,一次邮寄数十元、上百元到书店、出版社成批购买的不在少数。历届全国书市和在香港主办的中国书展,都把这套书作为重点陈列的展品。新华社多次用中外文向国内外播发丛书出版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读书》、《世界文学》、《中国翻译》等大报刊以及中央电视台、国际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多次介绍这套丛书。唐骏、李文俊、彭燕郊等知名作家都撰写过评论。丛书的影响甚至越过了国界,一些国外人士将这套丛书的发行,视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重视洋为中用、对诺贝尔文学奖持郑重态度的一个标志。瑞典诺贝尔图书馆收藏了丛书精装本,文学奖两位评委会见过丛书主编,谢尔·埃斯普马克教授并专程访问了漓江出版社,瑞典驻华大使馆和瑞典有关机构还在提供版本等方面给予了友好的帮助。丛书的出版无疑有利于文化交流,也有利于瑞

典皇家学院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文学。

*

*

*

出版大型丛书，通常会有一个庞大的编委会，而编委会真正起作用的未必很多。《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出版，不仅在书的内容和形式上有所开拓，在书稿组织上也希望做点新的尝试：不重名而责实，一切以质量为依据，以实效为依据。

首先确定总的构想和框架：在研究的基础上翻译，翻译与研究相结合，力求使每一卷成为了解该作家的优良选本并起一定的向导作用。这个总目标主要是通过四个方面的工作来实现的——

一、篇目：由于诺贝尔文学奖绝大多数是表彰某一作家的整体创作而不特指其某部作品，译本选目必须从授奖词中提名赞扬的作品和史家公认的作品中挑选，首先侧重其代表性和影响力，保证选目的权威，同时适当顾及篇幅、可读、整体平衡和少与其他译本重复等因素。

二、译文：尽量从原语种较好的版本直接移译，即使是译者寥寥可数的小语种作品仍绝大部分译自第一原著。由于组稿困难，个别需要转译的，或采用原著者自己翻译或认可的译本，或设法以原书进行参校，力求忠于原文，接近原文。译作以新译为主，少数旧译在收入丛书时作了必要的校订。希望较多地保持丛书的新鲜感，并传留一部分已有定评的佳译。

三、前言：务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作家作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论。强调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融入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只要言之有物，决不吝惜篇幅。福克纳卷的译序就长达4万余言，等于一本出色的福克纳导读或研究福克纳的入门小册子。

四、附录：尽量收齐授奖词、答词、重要访谈录和生平年表等有关配件，给读者提供较多的信息，提供据以作出自己评判的原始材料。这部分文字名为附录，实乃凤尾，读者对它的兴趣决不在正文之下，而且不可不读。

我们设想通过这些安排，在各卷有限的篇幅内扩充容量，提高质量，并共同形成特色，树立整体优势，不独使我国首次译介

的作家作品引人注目,即使我国介绍过的作家作品也能显示出新的翻译水平和出版水平,让购置了其他版本的读者仍然会对诺贝尔丛书中的新版本发生兴趣。

总的框架和构想确定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遴选和延请对获奖作家研究有素并能胜任译撰工作的专家来主持各卷译事:提出选目,组织翻译,撰写前言,辑录附件。这些工作有的由主持者一以贯之,有的则由他组织同道合力进行而最后总其成。实践证明,各卷主事人选准了,工作做到家了,整个丛书的质量就有了最基本的保证。

值得庆幸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名气和中国知识分子赤诚的事业心使我们顺利地得到了语种齐全、实力强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以及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广州等地许多专家的大力支持,先后共襄此一盛举的老中青优秀翻译工作者多达200余人。像董衡巽、冯亦代、赵少伟、吴劳译海明威,李文俊、陶洁译福克纳,巫宁坤译斯坦贝克,施咸荣译贝凯特,柳鸣九译萨特,罗新璋译纪德,桂裕芳译莫里亚克,林秀清译西蒙,高年生译伯尔,刘习良译阿斯图里亚斯,吕同六译皮兰德娄,力冈译肖洛霍夫,高慧勤译川端康成,李野光译埃利蒂斯,林洪亮译显克维奇,绿原译米沃什,文美惠译吉卜林,杨武能译海泽,郑克鲁译杜伽尔,郭宏安译加缪,章国锋译豪普特曼,王逢振译赛珍珠,吴岳添译法朗士,倪培耕译泰戈尔,邵殿生译索因卡,裘小龙译艾略特,刘星灿译赛费尔特,申慧辉译肖伯纳,黄梅译高尔斯华绥,石琴娥译拉格洛夫,李之义译海顿斯坦姆,林桦译延森,朱炯强译怀特,宋兆霖译贝娄,荒芜、汪义群译奥尼尔,潘庆舲译路易斯……都可说是恰当其人,有些人选甚至是国内再好不过的人选。他们长期研究所译的作家,熟悉其全部作品和风格,了解外界有关的评论,自然最有条件选准篇目、把握译文,也最有条件写出高水平的前言来。

*

*

*

丛书起初是分辑出版的,每辑各书在年代、国家、体裁上稍加搭配并有框架统一的封面,但辑与辑之间年代交叉,封面各异,读者保存和查找感到有些不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特邀著

名装帧设计家陶雪华女士统一进行整套丛书的设计,各卷封面统一,书脊上标明获奖年份,便于读者按年代先后排放。平、精装本均有前后环衬、作家肖像和丛书总序、总目,精装本还增加了彩印函套。过去已出的各卷,重印时将统一调整,个别卷为两位作家合出的也将单独分开。预计到1993年,如果还有两位作家获奖,丛书就将恰好排满90卷,以后新增1位增出1卷,《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这项系统工程也就大功告成并能不断增加活力了。

与丛书配合印行的还有正在编辑的《诺贝尔文学奖词典》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回顾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著作以及分类选本等。相信丛书出到八九十卷以至上百卷并有各类相关产品相继问世时,一座座华美的文学殿堂将吸引更多的读者一道跨入充满希望的21世纪的壮丽征程。

衷心感谢译者、读者和社内外同仁的携手合作!

衷心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教!

1991年12月26日

瑞雪天于桂林

· 译本前言 ·

现代希伯来文学的丰碑

——阿格农论

徐 新

在丰富多彩、万象森罗的世界文坛，希伯来文学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既具有悠久历史、又对世界文学进程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文学之一。发端于3000年前、以希伯来《圣经》为代表的古典希伯来文学被公认为人类古典文学的巅峰，对世界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然而，由于犹太民族的特殊历史遭遇，源远流长的希伯来文学自身的发展却曲折迂回、命运乖舛。尽管现在人们有理由争辩说希伯来文学作为犹太人的民族文学从未彻底止息，不仅如此，还一直顽强地在犹太民族的每日祈祷中、宗教礼仪上，在犹太经典里，在凡是犹太人生活过的土地上延伸向前，努力表现自己，但它毕竟随着犹太民族的大流散，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势头，特别是当它赖以生存的语言基础——希伯来语逐渐丧失作为犹太民族在日常生活中彼此沟通和交际工具的功能后，更是跌入了它

的“低谷”。在20世纪到来前的1800年中，这股曾在历史上掀起过惊涛骇浪、表现出汹涌澎湃之势的文学洪流再也掀不起巨涛，卷不起波澜，只能挣扎着曲折地向前流淌。偶尔在流淌过程中激起的一两朵浪花也是稍纵即逝，无法持久。只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犹太民族复兴意识的增强，特别是希伯来语的“复活”，希伯来文学才重新表现出生命的活力，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已经走过了复兴、发展阶段的现代希伯来文学似乎尚未引起世界的注意，它的流传还主要集中在犹太人、特别是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之中。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在当代，任何一种文学若要走向世界，为世人所瞩目，除了自身的发展繁荣外，还有待于文学名家、伟人的出现以及其代表人物获得世界性认可。对于现代希伯来文学而言，情况或许更是如此。因此，重新崛起中的希伯来文学在不断向前发展的同时，也在耐心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

1966年10月18日，当瑞典广播电台的电波传出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决定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以色列希伯来文学家阿格农的消息时^①，不仅世界各犹太社团、组织为之鼓舞，世界文坛也为之轰动。一时间祝贺的电报、信件像雪片从世界各地飞向他在耶路撒冷的居所。作为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用希伯来语进行创作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犹太作家，阿格农在文学上的成就不仅标志着现代希伯来文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使之受到世界文坛的重视。重新崛起的希伯来文学终于在阿格农手里走向世界。阿格农本人则自然成

① 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同时授予两位作家。与阿格农分享这一荣誉的是瑞典籍犹太人内利·萨克斯女士。萨克斯女士是用德语进行创作的犹太诗人，其诗歌以控诉德国法西斯暴行和反映犹太人命运著称。

为希伯来文学史上矗立起的一座现代丰碑。

从加利西亚到巴勒斯坦

阿格农原姓恰兹克斯(Czaczkes),全名为撒母耳·约瑟·恰兹克斯。1888年7月17日生于东欧加利西亚地区的一个犹太人小镇布察兹。其家族是一个以研究犹太教法典著称的犹太世家,属于犹太望族——利未族。历史上,利未族是古代犹太十二支派中的一个有特殊地位的支派,第一、第二圣殿时期主要在圣殿中供职,历代祭司均出自该族。据传其父是上古时期犹太著名大先知撒母耳的后裔,为纪念祖上的功德,父亲给阿格农取名为撒母耳。阿格农的双亲均为虔诚的犹太教教徒。父亲沙洛姆受过正统的犹太教教育,对犹太教法典颇有研究,尽管日后以经营毛皮生意为主,但一生都没有中断对经典的研究。此外,沙洛姆还对中古时期的希伯来诗歌乐而不疲,不仅常常高声颂读,闲暇时还动手写上几首自娱。其母艾斯特是位受过教育的女子,素来喜欢文学,一有空便捧起文学作品。在父母的影响下,阿格农自幼就对文学发生兴趣,5岁时便能提笔作诗。

阿格农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都是在他的出生地布察兹度过的。当年的布察兹在奥匈帝国的统辖下,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典型东欧犹太人居住区。19世纪的东欧犹太人居住区与16世纪以来出现在西欧的“犹太隔都”一样是犹太人“自我封闭”社会的代名词。居住区内的一切都严格按照犹太教法典的规定和传统的犹太人礼仪行事。生活这样的环境中不仅使阿格农诸

熟犹太民族的传统习俗，还使他与这座小镇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日后的创作中，布察兹不仅经常作为故事的背景写进作品，其人物风光亦成为他的创作灵感和重要素材来源。

犹太民族是世界上历来注重对子女进行民族传统教育和文化传授的一个民族，他们把对子女的教育放到关乎能否保持犹太传统和维护犹太信仰的高度上来认识。在这一传统影响下，阿格农3岁起便被送入当地犹太小学“科来尔”，学习犹太人的圣书《圣经》和犹太教法典《塔木德》，回到家中还要跟随父亲诵读《哈加达》一类法典，跟着当地犹太拉比学习有关宗教知识。9岁读完“科来尔”，又进入犹太经学院接受系统、正规的宗教教育。系统的学习和正规的训练不仅使阿格农谙熟犹太教义，精通犹太法典，在思想深处树立了犹太法典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成为一个终身守教、按犹太教习俗生活的虔诚犹太教徒，还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使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保持着一种自《圣经》希伯来文学问世以来的传统风格，即文学与宗教相结合的叙事风格。对于这一点阿格农一直铭记在心。当他登上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发表获奖演说时，还专门提到这一点，并把自己的文学成就归结于早年所研读的经典。

阿格农所受到的教育虽始于宗教，却并没有止于宗教，主要是因为阿格农成长于一个社会变革的时代。在犹太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下，生活在东欧的犹太民族不再仅仅满足于传统的宗教教育，而是越来越多地注重对世俗学科和欧洲文化、科学的学习。进入犹太经学院学习的阿格农除了研读《塔木德》一类经典和相应的诠注外，还阅读了众多的文学作品，包括欧洲文学名著、民间传奇传说，以及世俗希伯来作品。此外，他还在家庭教师的指引下学习德语，并“读遍了凡是能得到的全部德

文书籍”^①。

阿格农的青年时代正值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欧洲大陆蓬勃兴起。1897年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第一届代表大会向全世界犹太人发出了“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公共法律所保障的犹太人之家”^②的号召，给正在探索寻找犹太民族解放道路的犹太人以巨大鼓舞。阿格农和当时许多犹太青年一样，不但在思想上完全赞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把它看成是从根本上解决犹太人千百年来倍受压迫和迫害这一历史难题的唯一办法，而且在行动上积极投身于这一运动中去。发生在20世纪最初几年与犹太人有关的事件对阿格农政治思想影响很大，除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外，还有发生在贝亚利斯托克的犹太人被集体屠杀事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西奥多·赫茨尔的逝世，以及他所支持的竞选奥地利国会议员的犹太政治活动家伯恩鲍姆的落选等。1907年尚不满20岁的阿格农在宗教和民族使命的共同驱使下，毅然决定离开自己的家，告别生活多年的故乡布察兹，踏上了前往巴勒斯坦、到犹太人心目中的祖国和圣地落户定居的征途。在途中，居住在维也纳的叔父曾力劝其不要前往满目荒凉的巴勒斯坦，并愿意出资供他在利沃夫读书，但他谢绝了叔父的美意，不改初衷，义无反顾地前往巴勒斯坦，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是个行动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阿格农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问题上的观点对他作品内容的取舍有着重要影响，他日后写成的作品中有不少都反映了他的这一政治观点。如果人们仅仅从政治角度出发，对反映这一观点的作品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过多指责，不仅没有必要，也不恰当，因为，无论从历史的观点出发，还是从当时犹太民族的实际遭遇出

① 转引自阿格农“获奖演说”，参见本书附录。

② 钟冬编：《中东问题80年》，新华出版社出版，1973年，第15页。

发，阿格农对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态度都是既非常自然，又十分正常的。

1905年，阿格农应希伯来评论刊物《哈耶》责任编辑的邀请来到当时在奥地利管辖之下的东欧重镇利沃夫工作。利沃夫是当时的一个犹太文化中心，出版有众多犹太人办的报刊。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阿格农勤奋地为数家刊物撰文写稿，尽管这时的文笔还很幼稚，所写的东西并非完全合乎专业标准，但毕竟磨砺了手中的笔，改进了自己的写作技巧，为日后的文坛生涯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这期间的生活还开拓了他的眼界，增长了他的知识，培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对利沃夫的感情使他在前往巴勒斯坦途中绕道对利沃夫作了专门的访问。对于阿格农来说，这次访问的最积极成果恐怕是与约瑟夫·海姆·布伦纳的会见。布伦纳长阿格农8岁，是当时希伯来文坛上一位已有一定名声的作家兼文学评论家。两人的结识和由此播下的友谊在几年后结下了硕果。阿格农来到巴勒斯坦后写出的第一部小说集即由布伦纳代理出版，从而确立了阿格农在文坛上的地位。

阿格农是在犹太复国主义崇高理想影响下前往巴勒斯坦，与当时成千上万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青年一样，为的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改造巴勒斯坦，建设犹太家园。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阿格农希望通过体力劳动献身犹太民族复兴事业的愿望并没有实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因为“一时找不到工作，只得另谋生路”^①。他先是在巴勒斯坦雅法市土地安置办事处工作，稍后在“锡安热爱者协会”和“巴勒斯坦局”谋到秘书的职位，并在“犹太治安法庭”任义务第一书记员工作。从事

① 转引自阿格农“受奖演说”，参见本书附录。